

白话文的前世今生

韩昊洋

白话文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早已运用自如，熟视无睹。然而，在100多年前，它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生事物，是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之一。今天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先生逝世55周年纪念日。此刻重新回顾白话文的普及之路，让我们再次意识到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学改良新篇章 白话文体历史长

白话文就是一种以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处理的书面语。通俗地说就是“我手写我口”，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现代白话文主要有4种，分别是官话白话文（京白）、吴语白话文（苏白）、粤语白话文（广白）以及韵白（明代官话——中州韵白话文）。在这4种之外还有许多各具地方特色的白话，一并称为“土白”。我们日常生活中交流使用的白话文，是指官话白话文。

其实，白话文并非近代的产物，其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唐代的僧人为了推广佛教，宣扬禅门佛理，以音乐、画图和讲唱相互配合的方式向大众表演佛经中的故事。其中的图画称为“变相”，说唱故事的底本则称为“变文”。“变文”韵白结合、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广受百姓欢迎，这就诞生了早期的白话文学。宋代仁宗盛世诞生了说书这一带有白话性质的表演艺术形式，留下了许多话本，比如《水浒传》就是由宋代的活本改编而成的。元代的杂剧、元曲里也有不少白话的句子。到明清时代，众多白话小说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文而不文，俗而不俗”，即使识字不多也可以欣赏得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中国4大名著了。民国时期，出版了大量古代典藏的白话版本，白话小说、白话诗等白话文学作品蓬勃涌现，中小学教科书也开始使用白话文，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逐渐使白话文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文体。

重整风气启民智 中华文化传泰西

推广白话文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文言文艰涩难懂、文法繁复，讲求用典对仗、摹仿古人。用其写作的书籍典卷，普通百姓自然也难以理解。胡适先生的恩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感慨文言文之难：“中国无论如何倾向进步，其文字殊足为前途的大障碍。”应该说，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文体，使知识再也不是少数人的垄断资源，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其次，白话文的应用也是一种思想解放。“东学西渐”期间，一批外文著作被有识之士翻译为白话文，大量音译、意译的外来词充塞进汉语。语言是传输思想的介质，新词语的“大爆炸”实际上就是新思想的“大爆炸”。当时的中国人通过白话文这一工具吸取西方的先进思想，开阔自身视野。

此外，推行白话文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作为载体的白话文也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较之文言文，白话文浅显通俗、易懂易学，便于外国人理解掌握。“白话文存在表达准确性强、交际效率高的优点。以白话文为媒介，可以高效快捷地在全球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的姚双云教授这样评价白话文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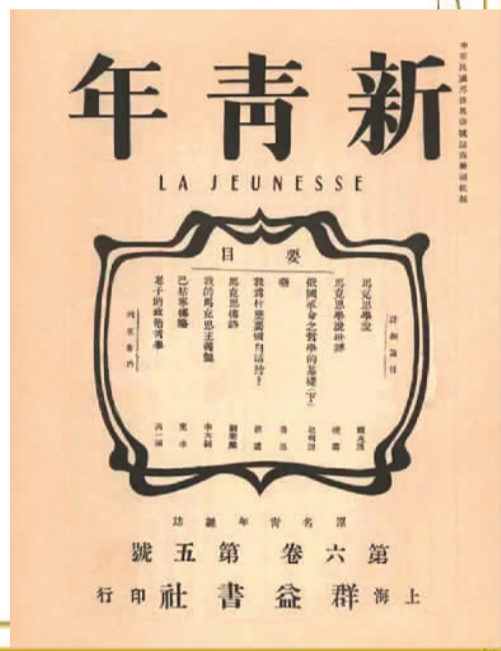
韵律优美底蕴深 文言古语不可忘

在全面普及白话文的今天，文言文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很低，其性质早已由原来的交流沟通方式演变为理解古籍的专用工具。但文言文凝聚和蕴含着中华祖先的智慧，是现代人不该随意丢弃的。

姚双云教授认为，学习文言文有助于更恰当地表情达意。文言文是经过历代古人积

累、加工、锤炼而创造出来的语言形式，在表达上具有言简意赅、典雅优美的特点，艺术价值很高。比如要表达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常用的就是“岁月如梭”“光阴荏苒”“白驹过隙”之类的文言文，如果换成白话文，似乎很难找到太过文雅的表达；再比如描述一个女孩具有“闭月羞花之美”，这样的说法文言韵味较浓，若换成白话文，显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言喻的。可见，同样的意思用文言与白话所展示的语言美以及给人的艺术感受是不一样的。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沉淀是承载在文言文上流传下来的。可以说，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对于国人来说，学习文言文可以更好地了解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充实个人的文化底蕴，提升文化品位。对于外国人来说，在中文达到一定水平后，适度接触和学习文言文，则可以加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兴起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变化。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基本内容。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从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鲁迅先生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讯、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在这些出版物的带动下，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而成为中国人日常使用的语言形式。

不论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语言，今天的人们早已视使用白话文为理所当然。在汉语国际推广的过程中，沿用至今的白话文功不可没。试想，如果让外国汉语学习者一上来就学习文言文，那不知要吓退多少对于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

那么，我们当代人又该如何对待文言文呢？中国历史典籍绝大部分是由文言文记载的，古典诗词、小说、戏剧等也是以文言文的形式呈现并流传下来的。所以，要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华文化，文言文是绕不过去的。近年来，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加大了文言文、古典诗词的内容比重，其目的就是让学生从小学习一定数量的文言文，为日后进一步学习中国历史、文学、艺术打下基础。

点点滴滴

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来说，当然是以白话文入门为宜。待汉语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适当接触和学习文言文。而对于有志于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学习文言文是必修功课。因为只有掌握了文言文，才能获得更多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白话文好理解 文言文也要学

刘菲

庙会上遇见毕加索

胡丽芳（17岁）

中国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我们学校的所在地——西班牙马德里USERA区显得格外的热闹，因为，区政府和当地华人联合举办了2017年“欢乐春节”庙会活动。

我们爱华中文学校有一个摊位，老师让我们大班同学下午在摊位当志愿者。于是，一放学，我就赶紧和同学们一起去附近的餐馆吃午饭。结果，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了一家有位子坐下来吃饭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附近的每家饭馆都坐满了老外。我还纳闷呢，为什么今天会有那么多的老外呢？后来突然意识到，原来他们都是来参加中国春节庙会的。只见好多西班牙人头上戴着庙会发的“鸡”帽，手上还提着从庙会买来的各种东西。

吃完午饭，我和同学们急着赶往庙会。快到庙会举办地点的时候，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远远看去，只见庙会门口排队的人如同一条长龙，大家都是为了进去逛庙会的。许多外国人都带着自己的小孩子一起来参观庙会。看他们一脸的笑容，就知道他们对中国文化是多么感兴趣。

我们一走进庙会，就被眼前琳琅满目的摊位和热闹的人群吸引住了，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糖画了。我一直想吃糖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多次回国都没能吃到。虽然我知道糖画是麦芽糖做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但能做出那么多可爱的形状，足以让我对它“一见倾心”。

在糖画摊位前待了一会儿，满足了心愿后，我来到中文学校摊位上，帮美术老师教小孩子画京剧脸谱。一个当地小男孩一边画京剧脸谱，一边说自己是毕加索。天哪，毕加索可是世界闻名的西班牙画家啊！他的话真的逗乐我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小男孩跟毕加索同名，也叫毕加索。

今年的春节过得很开心，希望年年如此。（寄自西班牙）



图为胡丽芳（左）和朋友们在庙会上

我的益母

威妮（十四岁）

我从4岁开始在丹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去年9月，我开始在丹华开设的国学班学习。我觉得这个班的课特别有意思，每一课都有新的内容，我们已经学了《大学》、《三字经》。我从古老的故事中，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是“孟母三迁”。《三字经》中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讲的是孟子小时候非常调皮，他的妈妈为了让他学习好的习惯、接受好的教育花了很多心血，一共搬了3次家，直到搬到了学校附近，孟子才开始喜欢读书，变得守秩序、懂礼貌。

我想，中国的妈妈们都从这个古老的故事里汲取了教育孩子的道理，从而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重视教育、严格要求孩子的传统。我的妈妈就是一个例子。像孟子的妈妈一样，我的妈妈常常教育我们做人不要偷懒，不要浪费时间，要努力学习，做一个成功的人。她也为我提供了最好的成长环境，还送我去最好的中文学校学习。每到星期六，不管自己多忙多累，她都风雨无阻地从海牙送我到鹿特丹去学习中文。

记得我小时候也跟孟子小时候一样不认真学习，妈妈对我说：“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不好好学习，很多梦想只能是空想，你不能做自己生活的主人。但如果你努力学习，就可以达到你所设定的目标。世界上没有人能为你安排生活，需要你为自己负责。”现在，我长大了一些，特别感激妈妈，如果当初她没有告诉我这些重要的道理，我就不会努力，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想，我之所以能在荷兰学校表现不错，成绩优秀，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妈妈，她接受了很多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她就是我的“孟母”。

（寄自荷兰）

彼岸的年

陈乐思（16岁）

现在我所理解的年是漂泊异乡的学子，在手机上收到亲人和朋友祝福，却想着：这热闹离我太远了。

去年9月初，一人踏进陌生的国度。这是我选择的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每逢月夜，每逢过节，内心总是惦记着中国，回忆的思绪总会毫无征兆地涌来。瞥一眼墙上的挂历，一天一天，倒数着离过年还有多少天、多少个星期、多少小时、多少分、多少秒。我们相差着8个小时，相距了一万公里，心系祖国的感情虽强烈，却没有了以前的冲动。

春节期间，学校照常上课，自己也重复着与昨天同样的内容。努力去融入平常的节奏，都是为了麻木内心，使其停止思念家乡，以免内心波涛汹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孤独是无法避免的，但有时孤独能让你心境逐渐透彻，用与以往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少了一份浮躁，多了一份冷静。

谁不怀念国内的春节呢？谁不想过年回家团聚呢？但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能风雨兼程。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我留下了回忆给家人与朋友，带着亲友的祝福上路。愿回忆能化成风，拂过年夜饭桌上的家人的脸，掠过朋友聚会中的笑语。而我在一旁看着他们一切安好，心虽沉甸甸的，但也平静。

今天下了2017年第一场雪。大雪过后，凝视山顶白雪皑皑，似乎所有感情都伴着这雪飘飞，继而融化于土中。每日都被无数平凡景色感动，也许就是这股宁静，内心的另一个我开始正视这个世界。以往的喧嚣在漂泊的旅程中被丢弃，一人能更好地与孤独为伴。

当心足够强大，当春节成为奢侈，一句嘘寒问暖，足矣。（寄自英国）

信任

林倚伊（14岁）

有一位父亲跟儿子在户外玩耍。儿子爬到墙上想往下跳，让父亲接住他。在他跳下来之前，父亲讲了一个故事，故事中的父亲是一位美国富翁。这位富翁的儿子也爬上一面墙往下跳，可是富翁并没有接住儿子，儿子摔在地上，一面哭一面疑惑地看着父亲，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富翁对儿子说：“我让你摔这一跤是为了让你学到一课——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连父亲都未必信得过，何况其他人呢？”

讲完之后，讲故事的父亲也伸出手臂对儿子说：“来，跳下来吧，我会接住你的。”这时儿子的内心不安起来。但在父亲的连声催促下，儿子

还是咬咬牙闭上眼睛，跳了下去。他以为自己会重重摔在地上，但是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躺在父亲的怀里。父亲说：“我也想让你学到一课——有时候你连陌生人也可以信任，何况是你的父亲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疑心病。即使是对身边最亲密的人，也难免存有一丝提防心理。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往往无法相信那些不熟悉的陌生人。但是如果可以给予他人一些适当的信任，将会带给对方巨大的力量。在遇到困难时得到他人的信任与关心就如同旱地甘霖，会让人获得许多力量。

信任其实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存在，这种精神力量不知已成为多少人心中的精神支柱，也正是这彼此之间的信任，才会让世界处处充满着温暖。

（寄自日本）

让中华文化元素更多地展示在基础汉语课本中

刘香君

基础汉语课本指的是针对汉语为非母语的学者编写的，适合汉语水平为零起点的外国学生使用的汉语课本。我在韩国韩瑞大学教授汉语期间，使用和查阅了大量的韩国本土汉语教师编写的基础汉语教材，最深刻的体会是韩国本土基础汉语教材融入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相比之下，中国老师编写的基础汉语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元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基础汉语课本中文化项目的设置不是“超前”了，而是“滞后”了。

比如，关于“您贵姓”话题，韩国本土教材会呈现“百家姓”的姓氏文化；关于“你多大”

话题，韩国本土教材会呈现十二生肖的生肖文化；关于“一共多少钱”话题，韩国本土教材会呈现人民币的基本构成和图案，有的甚至将同一商品分别用人民币和韩币标注出在中国的零售价，一方面让韩国学生了解人民币的构成，另一方面让韩国学生对中国当前物价状况有一个感性认识。除此之外，韩国本土教材中还会设置类似于“文化小贴士”等辅助读物，用韩语简要介绍中华文化，中国的旅游景点、节日习俗、京剧、家常菜、电影、武术、中医以及中国人送礼、购物、请客、搭乘交通工具等内容均包括其中，涉及面广确实超过国内出版的同类教材。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反差呢？在国内常听学界发出这样的声音：汉语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元素“太多太突出”会给外国人以“强加于人”或强行“认同”的印象。有人认为“第二语言课程和教材首先是语言课和语言教材，而不是文化课和文化教材”。持这种观点的对外汉语教师往往认为，基础汉语课本应该是纯语言教学的教科书，外国学生要在汉语水平达到中级之后再开始学习中华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曾与一名编写过汉语教

材的韩国教师交流：“你觉得中国人编的汉语教材与韩国人编的教材有什么不同呢？”这名韩国教师对我说：“中国人编的教材在语言知识方面编得很好，但是不适用啊。”我也曾向韩国学生提出相同的问题。学生们说，他们选择教材考虑更多的是教科书中的内容是否实用，他们在学习汉语的时候也想了解中国，如果一边学习语言，一边了解中国，学习起来就更有兴趣了。可见，基础汉语课本不应该是纯语言教科书，应大胆地、多角度地融入中华文化元素。

很多外国学生选修汉语课，主要是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心。在我教授的200多名韩国学生中，74%的汉语水平是零起点，21%的汉语水平为中级，只有5%的汉语水平达到高级。也就是说，有74%的学生在使用基础汉语课本。可见，基础汉语课本不仅承担着教授语言的功能，更担当着传播文化的使命，尽可能多地融入中华文化元素应该成为基础汉语课本编写的基本原则之一。

初学汉语的外国学生，对中国和中华文化怀揣好奇与向往之心，他们想学得能够用得上的汉语技能，想了解中国现状、历史、风俗习惯等。倘若非要学生到了汉语中高级阶段才大量接触中华文化元素，则低估了学生们的认知能力和知识需求，也错过了传授中华文化知识的最佳时机。（寄自韩国）

（本文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外派汉语教师）



图为本文作者（左）和韩国学生在讨论课上